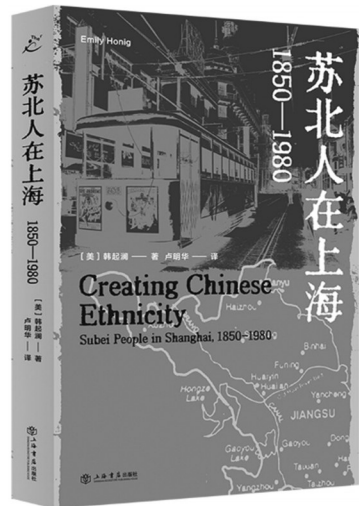


“苏北人”的标签是如何被建构的

□赵昱华



《苏北人在上海》
[美] 韩起澜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4年10月

地域标签,在网络和现实生活里都是流行的话题,经常伴随着各种刻板印象,“散装江苏”“广东人爱吃福建人”等梗已然被解构为了娱乐性的话题。但地域标签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正是美国历史学者韩起澜(艾米莉·洪尼格)通过《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试图解答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她选取了颇有样本性的城市——上海以及这个城市里的“苏北人”作为研究对象。

“苏北”一词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地理概念,用以指代江苏境内,长江以北,延伸至徐州的广袤平原地带。但在“苏北人”这一组合名词中,“苏北”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的、经济上的概念,指代那片因种种历史原因而经济衰退、社会失序的疆域,是一个由地理上的苏北与江南之间加剧的经济实力差所产生的人造概念。在作者看来,“苏北人”很有可能先于苏北这一地名,作为描述上海移民人口的词汇被“含糊地界定”,因而,是由“苏北人”定义了苏北。

书名中的“1850—1980”所容纳的时间界限,指明了“苏北人”概念的近代性。历史上的苏北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代表城市扬州曾是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繁荣史长达千年。但即便像这样的名城,也逃不过历史的兴衰,时运的此消彼长。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扬州的衰落,江南的兴起,以及洪水、灾荒或战争之故,苏北大批难民逃离家园,前往富庶的江南和开埠后正在崛起的上海谋求生机,他们就像同时期逃往美洲的爱尔兰人一样,遭受了当地土著居民“理所当然”的抵触,很多人只能从事黄包车夫、码头工人等收入微薄的工作,他们从事的苦力活又使他们被贴上了社会底层的标签。

这样的现象,归根到底是源自经济上的落差,发达地区的居民对欠发达地区移民的抵制,究其原因,既有对于就业岗位被取代的担忧,又有对于社会秩序混乱的恐惧。多重原因之下,上海的土著居民对蜂拥而至的“苏北人”戴上了有色眼镜。地域的隔阂进一步加大了社区之间的分裂,正如20世纪的美国社区经常因肤色与种族被划分成黑人区、拉丁区、白人区那样,到大城市讨生活的苏北人也因经济实力不济而被排斥在了上海土著的社区之外,又因同乡风俗的相近而聚居到了一起,于旧租界地带的河岸边形成了一片属于苏北人的聚居区,虽然环境与生活质量欠佳,但终归使初来乍到的移民有了落脚之地。经济要素提供的斥力,将这些居民置于主流社区之外;而文化要素则提供了一个吸引力,使他们聚居在了特定区域之内。出乎彼时上海当局的预料,聚居增强了苏北人内部的团结性,构建起了“上海苏北人”这一集体的群体身份意识,使“苏北移民”逐渐成为“江南土著”之外,上海的又一代表性群体。

苏北人的扎根客观上丰富了上海的社会结构,但在一定时期内,与土著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也难以避免。民国时期,上海当局曾多次试图清除棚户区内苏北人的住所,并将其遣送回籍,将这些苏北移民从上海边缘化——遵循着“先入为主”的原则,上海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那些更早的、来自江南的移民所界定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工厂内部,先入为主的江南人占据了工厂的大多数岗位,并对这些外来者争抢他们的饭碗而感到忧虑——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对于绝大多数“苏北人”而言,再差的岗位也比老家的生活要好,因此,他们会为了保住工作而加倍努力地

干活。

韩起澜在她的另一部以1919—1949年上海纱厂女工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中就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来自苏北的工人,因干活太过卖力,引起其他工人的不满,最终迫使她不得不辞职。这恰恰反映出了苏北人与江南人之间矛盾的本质——归根到底,族群矛盾是阶级矛盾的产物,而收入上的平等,才能带来身份文化上的平等。

至此,韩起澜从地理、经济、文化、习俗等多个角度对于“苏北”以及“苏北人”进行了完整的诠释。但显然,韩起澜教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仅仅出于了解历史的目的;在我看来,她研究社会分裂的缘由,是想要探索如何弥合族群之间的裂痕,修复这一裂痕给其中各方带来的创伤。

作为一本民族志研究,作者特别注意了中国语境下“籍贯”的重要性。“籍贯”本身也是一种认知构建的想象共同体,是一种对于特定地区范围内地理、文化、语音与经济的共同想象,经由历史被塑造为了一体,形成了新的族群。这种族群内部的向心力,既推动了地域内部共同发展,却又在地方主义的影响之下建起了壁垒,排斥外来者的进入。

但人为构建起的壁垒,也同样可以在人为的努力下被消解。这本书所透露出的,从更高的视角来看,苏北人在上海的遭遇并不是他们所独有的,上海是全国的缩影,而苏北人的命运,也是往昔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穷人们的命运。这种人为构建起的壁垒,随着社会进步,经济上的趋于平等,终将反馈于社会文化之上,历史的流毒终将被洗刷一清。

士大夫筑就的底层逻辑

□禾刀



《江南困局: 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
唐元鹏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年8月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浙江湖州董氏家族对“冯谖市义”的依葫芦画瓢,非但未能挽救曾任大明朝礼部尚书董份的民间声誉,反倒沦为东施效颦的笑柄,曾经如日中天的士大夫,结果反遭乡邻打砸哄抢,着实令人唏嘘。

在本书作者唐元鹏看来,像董家这样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士大夫家族,在晚明江南并非孤例。本书所撷取的晚明六个故事中,火烧董家楼、夜掘周家坟和王氏复仇记三个故事都与董范之变类似,均为江南士大夫与民纷争后导致的恶果。

仔细琢磨六个故事不难发现,每个案例似有特定背景和原因,但个性之中又有某些共性,那就是主角无一例外与士大夫有关,“一开始似乎只是些乡间龃龉,泥潭深陷。轻则地位不再,财势散尽;重则被逼上绝路,家破人亡”。

董份曾官至礼部尚书,一门四进士。范应期有科举移民之嫌,但状元身份实打实。官位虽然不高,家族却敛财有道,富甲一方;荆熊分祖故事中的“汤宾尹是科举全国第二,梅家是‘一门三进士,兄弟四举人’;董其昌因画闻名于后世,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郑鄮曾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其父亦为状元;夜掘周家坟中的陈一教家三进士,祖坟被挖的主角周延儒更是两度出任内阁首辅;王

氏复仇记中的赵士锦家是一门四进士的顶级簪缨世家。

士大夫家族之间往往可以挖掘出盘根错节的纽带。他们彼此间常常会通过姻亲等方式,增进彼此联系,筑成利益同盟。此外,士大夫们还会因为同乡、师生、同宗等各种五花八门的原因勾连结合,裙带抱团。

士大夫得以成长为庞大的利益集团,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坐享减免赋税之便,“士大夫可以获得优免待遇,也就是可以免除个人田产赋税和人丁徭役”。换句话说,士大夫不仅拥有无可比拟的政治光环,在经济方面也是优势尽显,从而注定社会资源必定想方设法向士大夫家族靠拢集中。因之,晚明江南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不少人会带田产、房产投献”士大夫门下,以此获得减免赋税徭役之利。当然此举还有另一大潜在利好,那就是借此可以得到“大户荫庇,不受别人欺负”。

有士大夫大户的庇祐,奴仆仗势欺人,添油加醋,加码自肥,渐成惯例。面对日益难以催收的赋税,一些游走灰色地带的“豪奴代行官府职责,下乡赋税”。此举无异于执法权外包,豪奴当然不是无私奉献,借机自肥才是他们的生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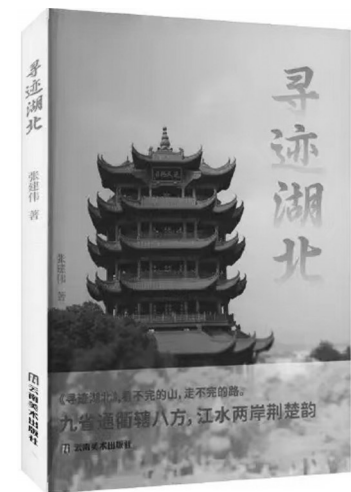
道,民怨于是越积越多。

历史表象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明朝走向覆灭,实与社会底层逻辑密不可分。本书所罗列的六个案例看似各有不同,但又隐含着共同的现象,即底层民众对士大夫精心构筑的社会底层逻辑不满情绪累积。江南拥水陆交通之利,倚鱼米之乡之基,理论上讲应该是物丰民富。然而,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之家的财富分配撕裂,二者矛盾加剧,发展的结果往往只是让士大夫更富有更强大。曾有考证,嘉靖首辅徐阶家族便坐拥良田几十万亩,而士大夫家仆过千者亦不稀罕。

在唐元鹏看来,加剧晚明士大夫与民众矛盾的还有另一重因素,那就是“古风”不再。唐元鹏指出,“‘湖州自嘉靖初以前,古风犹在。’何为古风?就是为富且仁,照顾孤弱,为贫也安,勤奋持家,大家维持着宗教礼法下的城乡秩序。但隆庆之后,士大夫印象中的古风不再吹拂”。“古风”原本是缓和士大夫与民众矛盾的泄压阀。一旦这个阀门失灵,意味士大夫与底层民众间的矛盾和解通道堵塞。从这层意义上讲,本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危机时刻,不仅仅属于士大夫群体本身,同时也是晚明飘摇亮起的一盏盏红灯。

山河入卷,文脉长存

□诸纪红



《寻迹湖北》
张建伟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24年1月

黄鹤楼前烟波浩渺,武当金顶云海翻涌,神农架中林涛阵阵,赤壁江畔惊涛拍岸。张建伟以脚步丈量荆楚大地,用文字勾勒千年文脉,将湖北的山川胜迹、历史人文娓娓道来。

湖北素有“九省通衢”之称,长江与汉水在此交汇,孕育出独特的山水格局。书中对自然景观的描摹,既有“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意,也有“武当七十二峰朝大顶”的雄浑。木兰天池的层峦叠翠、恩施大峡谷的鬼斧神工、腾龙洞的地下奇观,每一处景观都在作者笔下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令人动容的是,作者始终将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紧密交织。登临古隆中,诸葛草庐的茅檐低小间,流淌着“鞠躬尽瘁”的赤诚;驻足荆州古城,斑驳的城墙砖石里,沉淀着“大意失荆州”的警世之思。在归元寺的晨钟暮鼓中,读者能触摸到禅宗文化的深邃;于曾侯乙编钟的余音里,可听见礼乐文明的回响。

书中对历史遗迹的探访,堪称一场跨越时

空的文明对话。黄鹤楼上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典故,将唐诗的璀璨星河投射在蛇山之巅;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让知音文化在九真山的溪涧中流淌千年。当作者站在赤壁古战场,眼前浮现的不只是“樯櫓灰飞烟灭”的战争场面,更是苏轼“大江东去”的旷达胸怀。这些历史碎片的拼合,构建起湖北作为楚文化发祥地、三国文化核心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立体图景。

作者在追寻古迹时始终保持着当代视角。在武当山紫霄宫,他既描绘建筑群“悬挂在悬崖上的故官”的奇险,也思考道教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探访绿林寨古山寨,既还原王匡、王凤起义的历史现场,也反思“绿林好汉”文化符号的当代转化。这种古今对话的写作姿态,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遗迹,而是流动的文化血脉。

在快餐式旅游盛行的当下,《寻迹湖北》提供了一种更深层的旅行范式。作者拒绝走马观花的打卡式游览,而是倡导“用心去旅行,用心去体

会”的文化沉浸。在荆州关羽祠,他从“赤兔马亭”读到忠义精神的时代价值;于随州炎帝故里,他在青铜器纹饰中感悟华夏文明的源头。这种旅行方式,本质上是对文化根脉的追寻,是对“我们从何处来”的永恒追问。

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更具现实意义。黄陂泥塑“泥人王”的匠心传承,武当武术的养生智慧,恩施土家织锦的绚丽纹样,这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在作者的笔下重获新生。当我们在书中看到老耄老匠人精心雕琢泥塑罗汉,听到神农溪畔的船工号子,便能深刻理解: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博物馆里的静态保存,更是活态传承中的文化自觉。

合上这本书,长江的涛声仍在耳畔回响。张建伟用文字搭建起一座桥梁,让读者得以穿越时空,与荆楚大地的山河对话,与中华文明的精神共鸣。在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越发珍贵的时代,《寻迹湖北》不仅为旅行者提供了指南,更给予每个中国人重新认识文化母体的契机。